

CIWEIGE  
XIAOSHUOJI

# 茨威格小说集

[奥] 斯蒂芬·茨威格





[奥]斯蒂芬·茨威格

高中甫 韩耀成等译

# 茨威格 小说集



54

**茨威格小说集**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韩耀成等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1/8 插页2 字数447,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

书号: 10151·557

定价: 1.82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斯蒂芬·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十六篇。这些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抨击了法西斯的暴虐，揭示出资产阶级的精神空虚和腐朽没落，渗透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上，独具特色：构思巧妙，情节多传奇性，讲究语言的准确、生动和形象化，尤以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见长。

书末附录茨威格的绝命书及生平年表。

## 目 录

前言	1
灼人的秘密	14
夏天的故事	84
桎 梏	96
恐 惧	137
热带癫狂症患者	189
奇妙之夜	247
巫山云	310
月光巷	355
看不见的收藏	375
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390
雷波莱拉	399
旧书商门德尔	427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455
一颗心的沦亡	523
一对酷似而又迥异的孪生姐妹	557
象棋的故事	584

附录

绝命书 .....	639
生平年表 .....	640

## 前 言

在艺术中勇气和信仰是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的。

——斯·茨威格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流亡在巴西的奥地利知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同妻子一道自杀于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市郊彼得罗保里斯的寓所。几天之后，这座城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商店停止了营业，街上挤满了人群。他的灵柩上布满了鲜花。共和国的总统、部长、将军、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大学生都参加了葬仪，把灵柩送入公墓，安葬在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在巴西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过如此盛大的葬礼，而在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流亡的作家客死异国能享有如此厚重的哀荣亦属罕见。

都说自杀是一种懦怯的行为。这也对，但也不完全对。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说自杀是对责任的一种逃避，是信念的丧失，是懦怯的表现；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这样说是不公允的，自杀也还是需要勇气的。它是对不义和邪恶的一种控诉和抗议，尽管这是一个弱者的绝望的控诉和抗议（那种畏罪自杀者另当别论）。在希特勒法西斯猖獗时期，相继有一批德语作家

和学者自杀：作家图霍尔斯基死于一九三五年，戏剧家恩斯特·陶勒死于一九三九年，诗人和批评家瓦·哈森克莱维尔和批评家瓦·本雅明死于一九四〇年，而茨威格则死于一九四二年。对这些人的弃世（其实在文学史上自古至今是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自杀者的名单的），不能简单加以贬抑。就茨威格而言，他亡国丧家，颠沛流离，但没有在集中营、刑讯室受到折磨、拷打，无论是在流亡伦敦或巴西时，他都有自己的住所，过着在物质上并不匮乏的生活。他有名望、地位。他本可以积极地投身到反抗法西斯的艰难斗争中去（他在为救助流亡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可以象一个庸碌的苟且偷生的文人或市民在乱世中蛰居起来。做一个前者，他缺少足够的信念和信心，而后者他又不屑为之，因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正直的作家。目睹被蹂躏的欧洲、沦亡的故国，以及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悲愤、揪心之痛，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茨威格，他不愿再一次目睹惨绝人寰的杀戮，不愿再一次经受精神上的折磨。一九三九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不愿再经历、再熬过第二次战争。”他相信曙光的到来，但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他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同那些自杀的作家、学者一样，与其说他的死是一种轻生，是一种逃避，毋宁说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抗议。在残酷的斗争年代，在血雨腥风岁月，政治上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所有的就是他们的才智和生命。当他们觉得才智在武器面前无能为力时，他们就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一次软弱和消极的抗争。文人书生之血，挥洒处亦是留下斑斑痕迹的。



茨威格为世人挥洒下他对法西斯野蛮势力表示控诉和抗议之血，他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颇值得珍视的文学财富。他的著作，无论是小说还是人物传记，在生前就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拥有大量的读者。在三十年代初期，他的一些作品，如《初次经历》就印了五万册，《热带癫狂症患者》印了七万册，《感情的混乱》印了九万册之多。有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如《灼人的秘密》、《巫山云》、《象棋的故事》等。希特勒上台之后，茨威格的著作被焚烧，但电影院还依然上映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院里还上演由他编写脚本的歌剧。茨威格不仅在德语国家受到了欢迎，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影响。在四十年代，据统计，他的著作就被译成近三十种文字，其中有由高尔基编的俄文版五卷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足以使他跻身于当时著名德语作家，如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卡夫卡、霍夫曼斯塔尔、海尔曼·海塞等人之列而毫无愧色。

茨威格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独具的艺术特色。巧妙的构思、传奇性的情节，悬念的设置以及形象化的语言，都使读者不能不为之赞赏。《恐惧》中那个有外遇的妻子，由于被一个陌生女人发现，遭到不断的敲诈和恐吓，因而陷入恐惧之中，精神濒于崩溃，当她最终忍受不下去而向丈夫坦露真相以求得心灵安宁时，丈夫却向她请求宽恕，因为那个陌生女人正是他雇来折磨她的；《巧识新艺》中的主人公出于好奇跟踪一个扒手。当他看到准备行窃的小偷有可能被人发觉而走到跟前欲加提醒时，小偷却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茨威格的小说，大都有这种出人意外、令人赞叹的新颖之处。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开端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会使读者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这足见作者的匠心。

茨威格的小说多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这是与他的作品多是以下意识的活动、以人在激情的驱使下的遭际和命运为主题有关。这种形式使他可以淋漓尽致地去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剖析，去对人物的精神状态进行细腻工笔式描绘。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可以说都是一幅人的精神受难画，一张形象化的心电图。探幽抉微的描写，细致入微的表现，使人物富立体感，有感染力，使读者不能自己地同主人公一道去经历、去感受。掩卷之后，读者面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令人惊悸的灵魂。高尔基在称赞茨威格作品的独特手法和感染力时说道：“您写的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及其悲剧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羞耻地哭了起来。”<sup>①</sup>

正是由于茨威格作品多是写情欲和意识与下意识之间的冲突，写处于冲动的支配下不能自制的人物，这也就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弱点。一方面，过多的、不厌其烦的内心刻画使作品显得臃肿，拖沓、不够洗炼，有时令读者感到厌倦，如《奇妙之夜》、《一颗心的沦亡》等都有此弊。茨威格是意识到了这点的，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总是责怪自己心理描写太多，缺少你们俄国作家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率真”<sup>②</sup>。而另一方面，情欲和下意识的主题也必然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性和现实意义。尽管如此，做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他在作品中怀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炽热同情，对邪恶势力的抨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虚伪

---

<sup>①</sup> 见《三人书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此处女主人公指《巫山云》中的人物。

<sup>②</sup> 同上，第142页

和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的空虚贫乏所做的揭露，在今天依然具有认识上的价值；他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的烙印。茨威格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大体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备遭灾难和痛苦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希望的时代。它不仅决定了茨威格的生活道路，也规定了他的创作道路。

一八八一年，斯蒂芬·茨威格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物质上的优裕无法代替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舒适的环境掩盖不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在这种条件下，从童年起，音乐、剧院、文学就成了他的慰藉。他在一首诗里，把家庭称之为“狭隘的监狱”。一九〇〇年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翌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随着一个新的、充满动荡不安的世纪的来临，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在世纪交替前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各帝国主义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各民族各阶级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各国革命浪潮的兴起。资产阶级社会充满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它的腐朽性，空虚性明显地表露出来，做为一个阶级整体来说，越来越没有生机。目睹这种丑恶的现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陷入苦闷、徬徨的境地，孤独、绝望的情绪主宰了他们。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内向化了，从社会的现实中遁逃出来，而进入人的精神领域里。他们需要并也在寻求新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个人的内心苦闷和精神上的骚动不安，来

抒发纯属个人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描写社会、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以客观事物为纯描写对象的自然主义便使他们抛弃了。于是表现主义、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颓废派便应时而起、应运而生。当时，在世纪的转折期，属于维也纳文学艺术界中心的是作家赫尔曼·巴尔（1863—1934）——他首先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克服”，澄清和阐释了表现主义——，是剧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维也纳后期印象主义的代表——，是被称为“文艺复兴王子”的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新浪漫派和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以及表现主义诗人里尔克（1875—1926）、唯美主义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1868—1933）等人。在维也纳，左拉和易卜生是“过时”了，年青的文学一代所崇拜的半神是法国的玛拉美、波特莱尔和魏伦。茨威格不完全是他们的同时代人，不完全是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但他的创作活动的开始和发展却是在这种文学气氛中，在他们的影响下进行的。在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到这种影响。纯主观、纯意识的东西，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的成份，这不仅在他早期的诗歌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1901年的《银弦集》，1906年的《早年的花环》），在他早期的小说中也时时可以感到。（他自己在谈到他的《银弦集》时曾说：这都是些表现“迷惘的预感和无意识的事后感觉的诗行，它们不是出之于自身的经历，而是出之于语言上的欲望”。）他早期小说中环境的作用、社会的因素都不占有重要地位，都不起作用，人物多半都在超时代、超空间的场里活动。我们似乎可以把他们放到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或任何环境中去。

谈到对他的创作的影响，不能不提及比利时诗人、被称为欧洲惠特曼的艾米尔·维尔哈伦（1855—1916）。一九〇二

年，茨威格到比利时专诚拜谒了这位久负盛名的诗人，以后他也一直同他保持着交往。他第一个把维尔哈仑的作品译成德文，介绍给德国读者。他在自传作品《昨天的历史》中不无骄傲地写道：“某种程度上是我发现了这个德国还完全不熟悉的人；而独自爱一个人，即永远意味着是双倍的爱”。刚踏上文学之路的茨威格把这位比利时诗人称他“青年时代的星座”，对他十分倾慕推崇。是他“给抒情诗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维尔哈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赞颂劳动，富乐观精神；而这些却正是年青的茨威格在主宰当时文坛的颓废派文学的影响下感到陌生和疏远的。他确是从维尔哈仑身上汲取了积极的力量。奥地利文艺评论家、国际斯蒂芬·茨威格协会主席艾里希·费茨鲍尔曾这样写道：“当茨威格在世纪的交替期初次从法文读到维尔哈仑的诗歌时，他那时正为了能有艺术经历而完全有意地从所有其它的现实旁一滑而过——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在那些年代他对故乡的山川草木从没有亲切之感，而在维尔哈仑的诗里，代替充满朦胧的、夜的情绪和模糊不清的轮廓的（他早期的诗和他做为榜样的诗就是这样的），是充满了力量和形象，充满了光和颜色和清晰鲜明的线条，这些诗给他揭示出了直到现在一直对他封闭着的领域，除此，他在这些诗里找到了一种完全刚毅勇敢的成分，维尔哈仑使茨威格能以感到亲切的目光去观察迄今他一直远离的生活中的事物，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带来了益处”。

茨威格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在《昨天的历史》里这样描写了他的青年时代：“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丝毫兴趣，我们生活中那些疾言厉色的争吵有什么意义呢？城市为选举而激动不安，可我们去图书馆。群众起

义了，可我们写诗和讨论诗歌。”综观他的一生，我们也可以说，他始终就不大懂政治。当希特勒疯狂迫害犹太人并焚烧他的著作时，他还允诺同希特勒的音乐局总监理查·施特劳斯合作，为他编写歌剧脚本；当他的朋友告诉他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时，他想到的不是法西斯德国应当受到惩罚，而是居民的死亡。一九三九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激烈地反对希特勒，但我却不适于去进行战争宣传。”这句矛盾的话倒是足可说明他政治上的幼稚。虽然如此，做为一个正直的、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作家，茨威格对时代和历史事件不会完全无动于衷的，而它们也都会在他的身上、他的作品里留下深深的印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服过役，在战争文献馆和战争新闻发布局工作。战争的狂热宣传，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从未使他失去理性和良知。就在战争期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外国朋友书》的公开信，希望和外国同行共同建设欧洲文化。他从居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那里得到了回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和罗曼·罗兰、维尔哈仑等进步作家、知识分子一道，激烈地抗议民族间的杀戮，要求民族间的和睦。“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这是他发出的誓言。在丧失理智的民族狂热中，他们被自己的国人看做是“蠢人和卖国贼”，但是他们的正义呼声——尽管他们还看不清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却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本人还没有受到战争之苦、战争之害。做为一个有名望的诗人、作家，他情绪激昂地投入反战的行列，抨击战争。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的祖国奥地利被吞并，犹太人遭到屠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泛滥，这使他的人道主义、博爱的理想都化为泡影。在残酷的现



实中他感到软弱无力，他痛恨法西斯，但悲观的情绪无法使他提高自己反对邪恶势力的声音。在那段时间，他在与朋友们的通信中一再流露出绝望的情绪，朋友们称他为“悲观者”。一九三九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上次战争中我能讲话——讲反对战争的话，因为我有自己的语言、报纸、杂志，有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一切我们在中立的国家，在法国的朋友们都有。这里，现在我们是无用的。”在另一封信里他说：“出于绝望我在写我一生的历史”（指《昨天的历史》一书），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他在致前妻的一封信中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要“安安静静地消逝，并且用值得的方式”。这最后终于导致了他自杀的悲剧。

尽管茨威格不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作家，但两次大战及此间的历史事件依然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即使为数不是很多。《看不见的收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悲剧；在《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中控诉了战争给普通人（世事懵懂的农民，不问世事的书商）带来的灾难；在《桎梏》中他捕捉住一个现实性十分强烈的题材：民族间的和睦、博爱的思想如何粉碎了“义务”——去屠杀别的民族的义务——的桎梏；在《象棋的故事》里则揭露了法西斯野蛮势力对人的精神摧残。茨威格一生写的小说并不算多，在他的作品中，也只有这几篇有着较为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尖锐的现实意义；就是在艺术手法上，他也避免了细腻得繁琐的心理刻画。这几篇作品比起他那些以情欲、激情为题材的小说来，令人感到清新。这里我们看到，一当茨威格能够摆脱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当他把视野转向社会时，就会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增强多少呵！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主义对茨威格的创作是有影响的。这位著名的奥地利学者在廿世纪初期，先后发表了《释梦》（1900）、《关于性的三篇论文》（1905）、《诗人和幻想》（1908）、《图腾和禁忌》（1911）以及《俄狄浦斯和哈姆莱特身上的恋母情结》（1911）等著作，形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所谓“弗洛伊德主义”。他认为，各种精神神经病都是由于无意识的性冲突而引起的，而无意识活动中的本能冲动是摆布个人命运的决定力量。理智是不起作用的，是不能支配和控制人的行动的。在他的理论中，性欲、性冲动占有超乎一切的重要地位，它们是人从孩提时代就具有的生命动力。弗洛伊德也用他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创作，他用所谓的“恋母情结”，即乱伦的母子之恋来解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用杀父思想（“恋母情结”的另一种表现：即子对父的忌妒）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一些作家都乐于接受。在乔依斯、毛姆、慕西尔、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以及托马斯·曼、赫尔曼·海塞等人的作品中都明显可见其影响。就是今天，在西方作家和评论家中，它依然大有市场。

茨威格是比弗洛伊德稍晚的同时代人，他极其尊敬和推崇他的为人和他的学说。在一篇专论文章里茨威格写道：“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使人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做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说是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深化了一整代人的世界图象；我说是深化而不是美化。因为偏颇从来不会是幸福的，它只带来判决。……弗洛伊德从来不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们指出一条快乐之路，一种入地或上天的遁逃，

而永远是一条进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感谢他的贡献，使新的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自由地自知地和诚实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对茨威格说来，这条进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就是对精神的分析，对心理活动的探索，对无意识的观察。谜一般的精神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那些令人感到奇怪的人，仅就他们的在场就能燃起去认识他们的一种激情。”他要去表现无意识的冲动和可控意识之间的紧张状态，要形象化地描绘出情欲和冲动对人的支配作用。

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当说茨威格用艺术形象解释了弗洛伊德主义，但是翻开茨威格小说，我们确实明显地感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这一主题的。在《月色朦胧》、《灼人的秘密》中他刻划了儿童的青春期萌发前的心理状态。在《芳心迷离》、《月光巷》、《热带癫狂症患者》、《雷泼莱拉》、《巫山云》、《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中，主人公都是在情欲的驱使下，象失去理智的人一样不能自己，不计后果。《巫山云》中女主人公的委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女主人公的失身，《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男主人公的自杀以及《月光巷》中男主人公的杀人，无不如此。但是把人物放在与社会隔绝的环境，割断了他们与时代的联系，刻意地去描写、去表现人的下意识活动和情欲的主宰作用，就使人物的活动失去了得到合理解释的凭依。尽管茨威格着力地、细致入微地、合乎逻辑地描绘了人物内心活动的发展、变化，但深究起来，就令人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那样的飘浮之感。单纯的精神分析，无助于揭示人物与社会的联系，人物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基于生活，而不是出于冥想。对茨威格说来，激情、冲动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段，人只有在这中